

安徽三大家族

与近代中国实业研究

施立业 李良玉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本书得到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资助

安徽三大家族与 近代中国实业研究

主 编 施立业 李良玉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研究/施立业,李良玉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5650-0142-0

I. 安… II. ①施…②李… III. 民族工业—工业史—安徽省—近代
IV. F429.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2381 号

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研究

施立业 李良玉 主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85 千字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142-0

定价: 4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应当加强安徽家族史研究

作为安徽地方史学工作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展和深化区域史研究的问题,而社会史和家族史研究,在我看来,是安徽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个很值得着力探索、加强研究的领域。因此,我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加强家族史研究,以促进安徽地方史研究向深广发展。

这里所说的家族史,又可称宗族史。家族和宗族,严格地说,是两个具有各自内涵和外延的学术概念,宗族是拥有同一男性始祖的家族群体,家族则指五服之内的亲属群体。但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实践中,家族和宗族的概念,除针对特指的主体而言外,笼统地说,则很难加以区别,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家族就是宗族。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可以把宗族称为家族。”(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第10页)“有的学者企图将家族和宗族这两个名词加以区别,实在没有必要。”(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4页)

就学科而言,家族史是介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按我国目前学科分类,家族史属于社会学范畴,是社会学中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有可能正是由于如此分类,也由于社会学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加之有相当长时期人们对社会学的漠视,家族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领域。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也制约了历史学的发展。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学的再度兴起,历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才有所改变。

其实,家族史研究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大家知道,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血亲或血缘色彩非常浓重的国度,在古代,家国与国家是经常混用的两个词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实则是一部帝三将相家族史。清末民初的学者就曾指认过这一点。我国最早的家族史著述当是《世本》。后来由《世本》发展衍生出了谱牒类著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更促进了此类著述的发展,南朝时有《齐·梁帝谱》,后魏时有《后魏皇帝族谱》、《魏孝文列姓族谱》等。到唐代,唐太宗曾亲自干涉《氏族志》的编纂,武则天也曾主持制定《姓氏录》。受此影响,世家大族纷纷效仿,出现了大量有关家族史著述,诸如《大唐姓族系录》、《百家类例》等。有唐一代,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这类著述即有61部922卷。宋以后,族谱、家谱等谱牒类著述更走入“寻常百姓家”,作品不仅多,且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模

式或体例。对今人而言,这些都已成为家族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古代,中国特殊的血缘社会,促进了家族史研究,成就了传统的家族史学术门类。当然,传统的家族史著述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同时又为我们今天进行家族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学术基础。因此,在我们这一家族色彩浓厚且历史悠久的国度,历史研究如果撇开家族史这一视角,将不可能成为精深而完善的学术研究,历史学也将是有缺憾的学科。对地方史而言,同样如此。

开展家族史研究,对安徽学术界来说,具有学以致用现实意义。如同其他地区,安徽传统社会,历来是一个家族社会,家族一直在社会的不同层次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局面在解放后才逐渐改观。至今,除极少数偏远地区外,安徽的家族社会可以说已解体。不过,作为残余势力,某些地区家族尚有较大影响,今天的安徽也还烙有十分明显的传统家族社会的印记,安徽的历史特点也可从家族史研究中得到诠释。由此而言,家族史研究对今天的安徽社会发展自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就目前而言,加强家族史研究,是安徽史学界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选择新的突破点、深化学术研究的具有良好预期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史学界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部头者,诸如安徽历史系列专著,安徽重要历史人物丛书,安徽重大历史事件丛书,安徽文化史,安徽革命史资料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安徽历史名人词典等;有关安徽地方史的专题研究,诸如淮河流域开发史、皖江开发史、徽学、桐城派、皖派学术等有关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中一些特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省内区域史研究也已在各地陆续展开,诸如阜阳通史、阜阳文化史、安庆史话、巢湖史话、皖西简史、蚌埠史话等,还有各县市所编的“文史”、“史话”等等。不过,在取得硕果累累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最突出的是,如同粗放型的采矿,仿佛都已开发,但随开随弃,造成了相当大的学术资源浪费。因此,安徽地方史研究已面临选择新突破的关键时刻。窃以为无论从拓展新领域,还是从深入研究角度看,加强家族史研究,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深入的家族史研究,可在诸多方面弥补史学研究的不足或缺陷,具有深广的学术意义。

大而言之,加强安徽家族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国史研究。安徽家族史内容极其丰富,著名家族众多,可谓史不绝书。安徽家族史研究对国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此仅举两点可作说明:(1)在时空上,隋唐以前安徽北部世家大族势力较盛,如汉魏时期的亳州曹操家族、夏侯氏家族,从汉延续至南北朝时期的庐江何氏家族,魏晋时期的龙亢桓氏家族,等等。隋唐以后,安徽南部家族势力突起,超过北部地区。唐代以来,随着大家族南迁,皖南徽州家族群起,进入明清时期,更以集仕宦儒商于一体为特征。而江淮之间,明清时期大族星布,如桐城张氏、姚氏等家族,合肥龚氏与李氏家族,定远的方氏家族等等,都是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经久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安徽历史的一些区域性特点,可以从家族史中体现出来,而且安

徽家族史研究,将对解读和阐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等全国性历史问题,颇有助益。(2)安徽历史上有许多家族影响深远而广大。家族以其血缘关系具有的天然凝聚力,很容易形成团体势力。历史上,安徽家族往往一人起而全族起,一代兴而代代兴,枝繁叶茂,经久不衰。它们不仅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控制和影响着区域社会,而且其中许多还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亳州曹氏、龙亢桓氏以及凤阳朱元璋家族,都曾把持过国家最高权力。庐江何氏不仅重臣辈出,而且在学术文化领域也独领风骚数百年。清代桐城张氏家族父子宰相,康乾盛世,与有功焉。至于近代,合肥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贵池周馥,寿县孙家鼐家族等等,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开风气之先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总之,安徽人以家族群体为特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充当了弄潮儿的角色。由此可知,加强安徽家族史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史中一些重大史事人物的研究。

研究安徽史,更需要深入研究家族史。安徽家族发展的常态是,以仕宦起家,以文教延世。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商(含手工技艺)为社会经济主体业态,以农为主,非农即商,所有的家族都是以此为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然而家族之兴,亦即成为世族、名族,则是以仕宦发端的。检阅安徽地区现存族谱所记载,其家族大凡都是发端于仕宦,其兴盛也由于仕宦,千谱一律,几无例外。而使家族绵延昌盛,则又以文教为手段。就家族发展来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在官本位时代,一人仕宦,固然为一族之兴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尚无优秀的后继者,将会出现其兴也忽,其衰也速的结局。为避免此现象,唯有倡导文教,培育家族人才,巩固兴族之基。所以,安徽大家族都不遗余力地发展文教事业,都是文教兴盛之族。这点也表明他们在客观上为安徽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上述原因,安徽人才的兴衰分布,也大多是以家族集团为特征的。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有某家族兴,则某地某时期人才也就兴盛,当然,某时期某一地区某望族衰,也会出现某地某时期人才衰的现象。地缘与血缘因素在特定时空下相互作用,构成了安徽人才发展的又一区域性特色。

从家族史角度研究安徽历史,将会有新的认识,新的收获。安徽地方史中许多历史问题诸如安徽三大文化圈、人文面貌、历史特点、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背景与演变原因等,都与家族史有关。家族史以其特殊性,关涉许多方面,几乎涵盖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方面,赋税,土地,族产,兵役,食量,作物,市场,集镇等等;人口方面,数量,婚姻,家庭,人才,性别比例,人口流动与消长等等;文化方面,学校,学派,著述,文艺,戏剧,音乐,美术,家谱族谱,家族精神与理念等等;社会方面,伦理,礼仪,祭祀,墓葬,习俗,禁忌,娱乐,衣着,血缘与地缘关系,过继制度与继承制度等等;政治方面,法制,科举,官宦,行政,吏治,家规家法,家族内部管理,家族组织与地方政权地方治理等等。总之,无论是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军

事史,还是研究社会史、宗教文化史,都不能不关注家族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家族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就很难深入。

家族史既绵长,资料又丰富(除家谱、族谱外,还包括正史、碑传、笔记、方志、档案、考古资料等),研究领域广大,选题多多。不过,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加强安徽家族史研究,首先应从近现代着手。因为:一是近代为中国家族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家族最兴盛的阶段,具有典型性;二是近代中国家族史研究对解读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家族是如何因应时代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因、节奏与方式如何、特点如何,这些都对从宏观上解读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与发展具有学术价值;三是距今较近,资料丰富,且对研究者来说更具有记忆或历史现场体验价值,通过这一途径解读安徽历史,进而理解和解剖中国历史,会更真切更科学,也更有现实意义。

这便是我们组织召开“安徽三大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研讨会”并结集出版论文集的初衷。

施立业

目 录

前言：应当加强安徽家族史研究·····	施立业 / 1
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近代中国企业·····	汪谦千 / 1
孙家鼐的中体西用思想主张及其实践·····	徐国利 许 彬 / 9
孙家泰与寿州苗练事件 ·····	池子华 / 19
东至周氏家族与近代中国实业	
——以周馥为中心的考察 ·····	汪志国 / 26
东至周氏家族人才辈出及原因分析 ·····	程 莉 / 40
略论周学熙实业集团的经营模式 ·····	欧阳跃峰 / 49
从《负暄闲语》谈周馥的治生观 ·····	程立中 / 61
倪氏家族与皖南铁矿业 ·····	马陵合 / 68
倪氏财团投资近代企业概述 ·····	罗澍伟 / 78
倪氏财团与天津城市近代化 ·····	张绍祖 张建虹 / 86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经济 ·····	郭从杰 / 96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赈灾·····	李 强 / 107
倪嗣冲与民初淮河治理·····	陈 雷 / 115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匪患治理·····	梁家贵 / 120
民初尊孔读经运动中的倪嗣冲·····	于文善 刘家富 / 128

安徽省长倪嗣冲与张勋复辟事件史实考证·····	倪祖琨 / 135
应对与抗争：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外交（1913—1920 年）·····	刘家富 / 144
简析民国初年的安徽禁烟运动·····	吴修申 / 156
两汉之际安徽淮北地区法学世家陈氏研究·····	王玉洁 / 163
试述东晋谯国龙亢桓氏家族文化思想的多元化·····	金仁义 / 176
试论两宋寿州吕氏家族著述的特点·····	杨松水 / 187
小议桐城张氏家族·····	王智汪 / 208
李鸿章家族述略·····	胡 晓 / 216
校勘古典、传承古雠	
——近现代贵池南山刘氏宗族的文化史学贡献刍议·····	谈家胜 / 225
论宗法思想对徽州家谱的影响·····	徐 彬 / 232
明清徽州宗子小考·····	陈 瑞 / 248
史学散笔：中国家族史研究百年历程回顾·····	朱梅光 / 254
东至周氏家族研究述评·····	黎俊祥 / 262
家族人物研究方法论·····	徐修宜 / 273
朱升的儒学思想和学术活动特点·····	蒲 霞 / 277
论明清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	陈恩虎 吕君丽 / 285
晚清官方劝业绩效的制约因素·····	李 玉 / 300
后 记·····	编 者 / 313

安徽寿县孙氏家族与近代中国企业

汪谦干

安徽省寿县孙氏家族是明朝洪武年间由山东济宁迁来的，世代耕读传家。到明末清初，孙氏家族通过经商开始致富。清代中叶，孙氏家族通过科举考试，逐渐在政治上取得显赫地位，特别是孙家鼐 1859 年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后来又做了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孙氏家族的影响盛极一时。清末直至民国年间，孙氏家族又通过发展企业，如面粉企业、银行、水泥企业、煤炭企业、食盐企业等，再开风气之先，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孙氏家族与近代面粉业

孙氏家族最早投资的企业是近代面粉业。1897 年 9 月，孙多鑫、孙多森兄弟与亲友集资 17 万两白银，在上海苏州河畔莫干山路购置 50 亩地作为厂房，筹建了阜丰机器面粉有限公司，孙多森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此时，清政府正积极鼓励投资设厂，加上孙氏兄弟的叔祖父孙家鼐为吏部尚书，正受朝廷倚重，很快被批准“概免税厘，通行全国”^①。为了在同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孙氏兄弟花 2.2 万美金从美国订购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1900 年 6 月正式生产，日产面粉 2600 包。该公司从投产第二年起便逐渐获利，一直到 1913 年，每年赢利均在 10 万两左右。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粉工业进入“黄金时期”，内销外销两旺，粉价上涨，每年纯收益在 15 万两到 32 万两之间。1922 年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元气，又开始向我国大量输入面粉，一些小面粉厂经受不住冲击，破产倒闭。但阜丰面粉公司凭借稳固的基础、强大的实力、优良的产品、成功的管理，不仅渡过了难关，还一直稳步发展，先后租办了上海长丰面粉厂、无锡泰隆面粉厂、上海裕通面粉厂、上海祥新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获得了较好的赢利。其时，阜丰系统日面粉生产能力可达 51500 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厂日生产能力的 11.39%。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地沦为“孤岛”，经济畸形繁荣。阜丰面粉公司借助地利优势，也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据《中国

^①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03 页。

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估算，阜丰面粉公司从投产到1940年，账面赢利约为1580万元，为原始资本的37.89倍，平均每年赢利39.5万元；实际赢利则远大于此，仅1926—1937年的赢利就达1750万元，平均每年赢利145.83万元^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阜丰面粉公司陷入艰难的境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致使阜丰厂开工严重不足，主要是代磨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因限于小麦来源，自营业务开展较少。曾一度在小麦产地安徽蚌埠租用信丰面粉公司厂房生产面粉，但由于战争因素，不久即告停业^②。到40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卖出的面粉竟无法补给小麦。特别是1948年的“八一九”限价，更使阜丰公司多年的积蓄顷刻间被耗尽。1951年下半年阜丰公司参加联营处后，业务渐有起色，收支得以平衡。联营处结束后，该公司生产业务全部为政府加工。1955年10月阜丰公司参加上海私营面粉工业全业合营。1956年5月，上海市粮食局将阜丰、福新两合营厂合并成为该市唯一的面粉厂，称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厂从此结束了由孙氏家族主导它命运的历史。

阜丰面粉公司在1916年4月还与刘韵樵等在山东济宁合作投资建设了济丰面粉公司。济丰厂占地38亩，房屋近200间，于1918年7月13日正式开车生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面粉销路较好。1922年后随着洋粉的倾销，济丰厂的销售越来越困难，到1927年10月终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工。此后，该厂受政局影响较大，生产时开时停。1946年中共第一次解放济宁时，就与厂方合营生产。中共军队退出济宁后，该厂便停产。1948年7月14日，中共第二次解放济宁后，该厂被收归国有，先改为铁工厂，1949年春又恢复为面粉厂，此后被称为济宁第一面粉厂^③。阜丰面粉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在哈尔滨投资建立滨丰面粉厂，因效益不佳，不久停歇。

孙氏家族控制的通惠实业股份公司还投资河南新乡的通丰面粉有限公司。该公司1919年成立，有资本50万元，占地90余亩，职工300余人，1920年7月建成投产后，日产面粉5000袋，为河南省最大的近代机器面粉厂。生产的面粉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石家庄、南阳、郑州等地。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该公司被日军侵占。12月23日遭大火，粉楼全部烧毁。1939年8月

①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98～199页。

② 1948年6月，阜丰面粉公司租用蚌埠信丰面粉厂，改公司名为“信丰阜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生产面粉。但在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前，该公司负责人离厂而去。该厂随即被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参见《蚌埠市军管会为什么要代管信丰阜记面粉公司》，《江淮日报》1949年2月4日。

③ 参见仲跻忠、王鲁元：《济丰面粉公司今昔谈》，政协济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工商史料专辑》，1987年版。

重建后，继续由日本人控制。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第31分监部。1949年5月新乡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该公司。1955年1月，它与其他私营面粉企业一起合并成立新乡市公私合营电磨加工厂^①。

1953年，在香港的孙麟方创建了香港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即香港面粉厂^②；1961年，又前往马来西亚霹靂州红土坎兴建了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马来亚面粉厂。他续写了孙氏家族面粉业的辉煌。

二、孙氏家族与近代银行业

孙氏家族对我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最早从事银行业的是孙多鑫。他在1905年夏，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召唤，到直隶“综理官银号事”，执掌直隶的金融机构。其时，周学熙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孙任总办。周、孙通力合作，盘活了天津官银号积聚的资金，支持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在孙氏家族中对近代银行业发展作用最大的是孙多森。他是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在任上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派人到日本考察日本银行的组织、制度，后编成《中国银行章程》120余条；在任内通过了《中国银行则例》，该条例在北洋政府时期基本被沿用，仅在1915年和1917年有两次小的修改；改革人事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大力扩展银行分支机构；设法推广钞票发行；派员到各处了解商情。经过他的努力，中国银行才真正具备了国家银行的职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金融知识的机构。孙多森本想在中国银行有所作为，但由于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失去有力支持，且由于他未能满足袁世凯抽提中国银行钞票发行准备项下的现金的需求，引起袁的不满，只得于1913年7月离职^③。

但孙多森对银行业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15年6月29日，他与周学熙、张镇芳、阿穆尔灵圭、袁克文等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月8日，经农商部注册、袁世凯大总统批准，该公司正式成立。其经营范围广泛，为“经营各项实业之总机关。随时调查、择地，依次自行筹办或介绍筹办各项实业，并

① 参见新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乡市志》中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3～294页；新乡市政协、新乡市志工作组：《新乡通丰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② 1987年8月，香港面粉厂有限公司与南顺（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以19200万元出售了香港面粉厂全部股权。晓雷、石民：《购入香港面粉厂，南顺执到宝》，参见齐以正等：《大财团盛衰》，香港南北极月刊1990年版，第23页。

③ 聂其炜：《我和1913年时的中国银行》，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一切金融、信托、债票募集之业务”^①。孙多森就任该公司总裁后，便开始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该行正式开业，实收资本60万元。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同时设立天津分行。此后，相继开办了上海、汉口、北京分行。1930年6月将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不断地扩大分支机构。如在上海、北京、天津添设支行，在苏州、南京设立支行，在定县、郑州设立办事处。除因战争影响，汉口分行营业不振，于1928年10月撤销外，其他分支机构营业状况良好，增资过程也较顺利：1917年资本为64万元，1920年达到102万元，1921年增加为150万元，1930年资本总额为200万元^②。随着中孚银行的发展，孙氏家族在该行的投资越来越大，拥有的股权越来越多。通惠实业公司在该行的股权后也由孙家掌握，这样孙家就完全控制了中孚银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孚银行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定县、郑州及天津河东办事处，南京、苏州及上海西门支行等分支机构撤销，但中孚银行依托租界仍在营业。抗战胜利后，该行调整资本总额为法币500万元。由于失去有力的靠山，1946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借故吊销了该行的营业执照。孙氏家族使尽了浑身解数，多方托人说情，后通过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原委员长吴忠信找到蒋介石才准予复业。当然，代价也不小，孙氏家族除赠送大量的股票、现金、物品给有关人士外，还出让了不少关键职位，如请吴忠信担任中孚银行董事长、国民党官僚李运启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席德柄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中孚银行于11月15日复业^③，同时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撤销总管理处。但此后，中孚银行以及整个孙氏家族企业均江河日下，仅能勉强维持。中孚银行屡遭货币贬值后，更是雪上加霜。虽然1947年8月增设了芜湖分行，但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益，1948年9月只好再度撤销。

上海解放后，中孚银行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要求，办理人民币增资，调整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1950年7月加入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1951年10月1日改组为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所有业务、人事均由总处统一管理^④。

值得一提的是，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较早开办的商业银行，而且“上海华

① 参见《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

② 中孚商业银行：《中孚商业银行简史》，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Q289-1-16。

③ 孙锡三：《中孚银行停业复业的内幕》，政协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④ 中孚商业银行：《中孚商业银行简史》，上海市档案馆藏，卷宗号 Q289-1-16。

商银行经营国外汇兑，对外正式发表者，以该行为最早”^①。它在1918年上半年就正式经营国外汇兑业务，并与花旗、运通、朝鲜、台湾等银行商订代理规约，直接通汇。

孙氏家族成员中孙元方在北京政府时期的银行界也颇有声望。他1901年留学美国，1912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3年起任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中孚银行成立后，他一直主管上海分行，参与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多次被推举为董事。1922年9月、1925年9月分别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第三、四届副会长。1927年1月后银行公会采用委员制，孙元方于1927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委员。1931年10月上海银行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又当选为执行委员。1943年因病去世。

孙氏家族成员在银行界任职的就更多了。如孙多钰、孙豫方、孙晋方、孙观方等曾在中孚银行担任重要职务，孙瑞方曾任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孙多燧曾任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孙方尚曾任中国银行出纳部主任，孙翊方曾任金城银行、中南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孙炽方曾任国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孙麟方在抗战时期还曾购买建国银行，并在上海、南京、北京设立分行，但不久便因资金周转不灵停业。此外，孙耀东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抗战时期任伪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

三、孙氏家族与近代水泥业

孙氏家族对我国水泥业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孙家最早从事水泥业的是孙多鑫。1905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实施，全国掀起了一股投资企业的热潮。在天津的周学熙、孙多鑫既掌握一定的资金，又有办企业的经验，便决定投资兴办自己的企业，即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原名“唐山细绵土厂”，是直隶总督李鸿章1886年命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筹集官、商股银10万两兴建的，1889年投产。但该厂投产后先是亏损，后又被英国商人骗占。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交涉，周学熙于1906年7月7日终将该厂收回，并将该厂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新公司组建后，周学熙任总理、孙多鑫任协理。孙积极协助周清产核资、筹集资金、招募商股、制定章程、组织生产等。该公司所需资金开始主要由天津官银号承借100万元，孙氏家族也积极投资。该公司投产后，效益极佳，仅8个月就还清了全部官款。正当孙多鑫全力支持周学熙兴办北洋企业的时候，天不假年，这年12月29日孙多鑫突然患病去世。长期担任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

^① 徐寄廌：《最近上海金融史》上卷，上海华丰出版社1932年版，第129页；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

理、对北洋企业有较多了解的包培之认为,“孙多鑫是个沉默寡言、不喜出头露面而善于在幕后策划的‘诸葛亮’”;“北洋早期出现大规模的企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①。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召孙多森北上兴办企业。所谓兄终弟及,孙多森接过了兄长的事业,接任天津官银号总办、启新洋灰公司协理的职务。孙多森为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任期间,启新洋灰公司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利润率。孙多森1919年7月去世后,代表孙氏家族参与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是孙多钰,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孙多钰后来还参与投资江南水泥公司,任董事职务。可见孙氏家族对我国水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孙氏家族与近代煤炭业

孙氏家族投资近代煤炭业是在1907年参与创办滦州矿务公司。因开平矿产无法收回,1906年8月周学熙计划在开平矿附近设立一个滦州矿务公司,希图“以滦收开”,即通过“开发利源”,以“收回利权”^②。此举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农工商部也准予注册。该矿仍由天津官银号招股承办,仅几个月就把200万两的商股募齐。后又续招股本300万两。孙多森协助周学熙开展了各项筹备工作。此后,滦州矿务公司与英国商人经营的开平矿务局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终因势单力薄,滦州矿未能打败开平矿,被迫接受开平矿的建议,实行开、滦合并。周学熙、孙多森等人虽然未能实现初衷,但此举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

1907年冬,周学熙、孙多森等人,为实现“以滦收开”的心愿,保全地权,又向时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建议由官商合筹,招股100万两(只招华股),成立“直隶滦州矿地公司”,专为承办矿场用地及建筑场房等事,得到批准,招股工作进展也很顺利。该公司在开、滦合并后,仍然保持独立,完全由华商经营。

孙多森去世后,孙多钰又参与了滦州、开平煤矿的工作,先后任直隶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开滦矿务局天津局总经理、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等职,为该矿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孙氏家族与近代食盐业

孙氏家族最早从事食盐业的是孙多森。1893年其母在家乡去世后,孙多森

^① 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学银行》,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② 参见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感到家庭人口渐多，土地收益不敷支出，便由寿县迁居江苏扬州，向其姑父何维健租用盐票，经营食盐运销。1895年，孙多鑫离开两广总督幕府后，也来到扬州。这样，兄弟两人合力经营食盐运销。食盐运销利润大，风险也大。兄弟两人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决定改行，于1899年创办了阜丰面粉公司。

孙氏家族再次投资食盐业是1919年通过其控制的通惠实业公司投资建立了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资本原为25万元，经过3次增资，到1932年达100万元。其总公司原在北京，1930年随通惠公司迁至上海。孙氏家族成员长期承担重要的管理职责。如1938年3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选举董事7人，孙家有孙豫方、孙观方，选举监察人3人，孙家有孙陟甫、孙晋方。20世纪40年代孙晋方长期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总厂设在烟台西沙旺大街，占地40亩，有职员40余人，工人200余人。该厂平均每年约产精盐30万~40万担，约值100万元。在国内运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国外运销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日军侵占烟台后，该厂被破坏甚巨，一度时产时停，约于1940年终因无法生产而停业。新中国成立后，烟台通益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肇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辅中贸易进出口公司合作投资，在烟台盐厂原址成立肇泰实业公司烟台油厂，经营榨油业务。1955年3月29日实行公私合营^①。

六、孙氏家族与其他企业

孙氏家族还投资了其他企业。如孙家鼐本人不仅支持后辈经营企业，自己也参与创办企业。1909年，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设纱锭22344枚，规模较大^②。但当年11月29日孙家鼐便因病去世，未能直接经营企业。孙多森还协助周学熙创办了京师自来水公司。1908年3月，清政府决定在京师兴办自来水厂，名称为“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官督商办，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孙多森为协理。4月开始筹建，由天津官银号招股，共招来商股300万元，实际使用了270万元。该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阻力较大。周、孙等采用各种办法，使工程顺利完工，但该公司一直亏损。孙多钰也积极参与了我国早期铁路业的建设。他1909年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回国后，历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的工程师、总办兼总工程师，沪宁、沪杭甬两铁路管理局总办，湘宁铁路工程局总办，株钦、湘鄂两铁路总办，1923年1月~

① 参见滕宗海：《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史略》，《芝罘文史资料》第4辑。

② 参见袁鸣：《论我国之新式纺织业》，《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第77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7页。

1924年11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为我国早期铁路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孙氏家族对毛纺工业也有贡献。他们对1922年正式成立、经营毛毯出口贸易与毛纺工业的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投资，到后来“在股东中的孙氏家族及其亲友们所占的投资比重，加上中孚银行平津两行的投资，共达到60%左右”^①。孙氏家族的代表孙晋方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长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仁立公司在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毛纺织企业。到1950年已拥有毛呢纺织厂、地毯厂、蛋品厂和北京麻纺织厂等4个生产机构，还有上海分公司负责推销、采购，总管理处则兼营出口业务。1954年12月实行公私合营后，公司改名为“公私合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仅仁立毛呢纺织厂就发展成为有3000多人、1万多锭子的大型企业，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毛纺织厂。

总之，孙氏家族创办或参与创办的近代企业不仅创办时间早，规模也比较大，多数在行业内居领先地位，在当时颇具示范和导向作用。这些企业不仅为孙氏家族积累了较多的财富，也推动了我国相关行业的进步，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安徽省社科规划课题：“安徽近代著名家族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为AHSK09-10D69）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刘缉堂、吴洪：《朱继圣与仁立实业公司》，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